

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



歷史的戲劇性和諷刺性常常是這樣的出人意外，「圍堵中國」在今日提出可能又是一個新的例證。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當中國要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道的時候，西方列強反而來欺負和瓜分中國；而在本世紀70年代，當中國在毛主義熱潮之中實行「反帝反霸」的國際戰略時，頭號「帝國主義」美國卻要與中國修好，以共同對付蘇聯；現在，中國正在實行深刻的制度變革，廣泛對西方開放，然而，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卻又可能開始對中國採取新的「圍堵」(containment)戰略。

為甚麼歷史會出現這樣的戲劇轉折和政治諷刺呢？或者更加確切地提問：在今天的「後冷戰」時代，面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甚麼會把「圍堵中國」提到國際戰略的日程上來呢？本文認為，「圍堵中國」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維護自己的國際霸權(hegemony)的一個重要戰略，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相應的國力增長正是引起國際霸權可能變遷的重要因素。圍繞「圍堵中國」所產生的中美關係的波折，首先不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主要是國家利益的摩擦。因此，中國抗衡「圍堵」的基本國際戰略，也主要應當是通過更加深刻的制度變革來進一步增強國力，並形成擺脫意識形態色彩的現實主義國際戰略。傳統的狹隘民族主義反彈和無視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之間利益衝突的理想主義政策，都是應當避免的文化和政策傾向。建設一種「理性民族主義」，才是抗衡「圍堵中國」戰略的正確選擇。

在70年代，中國實行「反帝反霸」的國際戰略時，頭號「帝國主義」美國卻要與中國修好，以共同對付蘇聯；現在，中國實行制度變革，廣泛對西方開放，然而，美國甚至整個西方，卻又可能開始對中國採取新的「圍堵」戰略。這實際反映了西方世界尋找其後冷戰時代新國際戰略的過程。

戰略圍堵和經濟捲入：美國對華的兩手策略

早在1990年前後，在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體系解體之際，全球「冷戰」的戰略格局隨之發生根本變化。當時，西方開始對中國的國力作出重新評判，

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攀升至世界的第二位或者第三位，有輿論開始談論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就目前有關後冷戰時代美國戰略的討論來看，輿論逐漸從「中國威脅論」發展到提出應對這一「威脅」的戰略，其中的一種戰略就是所謂「圍堵」。中國被視作對美國最具潛在威脅性的敵手，兩國之間在政治、軍事、乃至文化上的對立越來越被突出。半年以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等美國主要報刊均以相當的敵意來談論中國的人權問題、西藏問題、台灣問題和軍備問題等^①。

從「中國威脅論」到「圍堵中國論」，實際反映了西方世界在尋找其後冷戰時代新國際戰略的過程。特別是美國，在逼垮蘇聯以後，成為唯一的世界霸權，同時又感覺到自己也在衰落。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新世界戰略？從90年代初到現在，美國戰略界和輿論界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在這個討論中，美國的對日關係、對歐關係、對俄關係、對東亞的關係和對第三世界的關係，都得到廣泛地重新考量。同時，在全球視野和抽象層次上，出現了像「文明衝突論」這樣的宏觀假設^②，給「圍堵中國」的輿論提供了學術背景、刺激和支持。總的來說，從目前的輿論看，美國有關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戰略的討論正向「圍堵中國」聚焦，「圍堵中國」的輿論已經形成。

在政策層次上看，目前還不能說美國政府已經形成了「圍堵中國」的政策。因為，從戰略形成的過程來看，由問題的出現到對問題的認知，再到形成公眾輿論與政府的戰略政策，是需要時間的。以當年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提出圍堵蘇聯的戰略為例，就有一個從輿論到戰略的形成過程。當時，最遲至1946年底，美國輿論已經廣泛地討論了蘇聯的可能威脅。同時，美蘇在德國、韓國和伊朗等問題上產生極大分歧，有些類似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爭吵。但在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就任國務卿和喬治·凱南成為馬歇爾的國務院政策班子主導人物之前，美國政府並沒有形成和確定圍堵蘇聯的戰略^③。

「圍堵中國」尚未成為美國政府的明確戰略和政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蓬勃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對美國資本很有誘惑力，要放棄在經濟上進入中國的機會轉而實行完全的圍堵，會遭到經濟界的反對。對應這樣一種利益需求，美國輿論和戰略界同時也在談論所謂「捲入」(engagement)和「接觸」。這一戰略強調美國對中國內部發展的介入，希圖通過在經濟、文化、安全乃至政治上與中國接觸，來保持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從而消弭中國對美國的可能威脅。

但是，無論是捲入或者介入，還是遏制或者圍堵，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對手、作為一個潛在的威脅。說到底，這兩種戰略都是要改變中國，以消除來自中國的威脅。在這個意義上，「圍堵」和「捲入」並不總是矛盾的。我想，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可能在喬治·凱南的經典樣式的圍堵戰略基礎上，發展出一套以「捲入」為上策、以「圍堵」為底線的新戰略來對待中國。在這種兩手並用的總體戰略中，「圍堵」依然是核心。

「圍堵中國」尚未成為美國政府的明確戰略和政策，原因在於蓬勃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對美國資本很有誘惑力。對應這樣一種利益需求，美國輿論和戰略界同時也在談論所謂「捲入」和「接觸」。說到底，這兩種戰略都是要改變中國，以消除來自中國的威脅。

資本主義的邏輯：從制度轉型到「中國威脅」

那麼，為甚麼美國會把中國視為主要的潛在威脅呢？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對立，常常被看做是主因。但是，這一解說不能回答一個問題：在中國奉行毛主義的時代，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距離比今天更大，為甚麼美國可以和中國修好並結成一定程度上的戰略夥伴關係呢？在我看來，決定中美關係的根本因素，還是利益的衝突和實力的對比。究竟中國在甚麼意義上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了威脅呢？我想，美國輿論界和戰略界對中國的主要恐懼，與其說是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來自對未來霸權興衰交替的憂慮。

在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界，一直存在兩派基本的戰略思想。一派是所謂現實主義(realism)戰略思想，講霸權之間的興衰交替，強調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相信只有通過建立霸權體制才能使世界安寧^④。另外一派是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ism)理論，主張通過經濟互惠，也包括通過國際組織的干預等手段，不同國家之間有可能發展出合作體制乃至形成世界和平^⑤。自由主義學者觀察到，在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他們根據康德(Immanuel Kant)關於永久和平的理論認為，民主可以成為和平的妙方^⑥。這兩種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持不同理解的理論，落在具體的戰略和政策問題上時，自然就會產生相異的主張。在目前的戰略討論中，主張「捲入」的學者，基本上屬於自由主義一派^⑦，它希望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中國變為具有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從而消除中國的可能威脅。但是，這種觀點仍要面對如下困難：第一，因為自由主義國際戰略思想強調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因素，故此即使在這一派內部，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強烈的疑問：為了甚麼目的而「捲入」(engage for what)？第二，採現實主義的一派擔心，哪怕中國的政治制度改變了，哪怕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再與美國相對立了，但中國的經濟力量和中國的可能擴張姿態，仍然會對美國的霸權形成挑戰。第三，從歷史上看，現實主義國際戰略思想一直是美國的主流^⑧。上述三個因素決定了美國對付中國的基本趨向：無論是不是同時採取「捲入」的手段，「圍堵」都成為基本的戰略框架。

當然，上述兩派都直言要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實際上，他們只是強調國家對立之中的不同因素：一派強調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認為解決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並最終表現到政治制度上來，兩國之間的對立就會化解；另一派則強調實際利益的衝突，認為國家之間實際利益的衝突很難通過一國的制度演變來解決。如果說，冷戰結束使中美關係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對立變得突出，那麼，這只能得到一層結論：美國需要使用包括圍堵在內的戰略來改變中國。可是，在「圍堵中國」的戰略中，還有另一層結論：「圍堵中國」正成為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一個國際戰略軸心。只有中國地位的上升和實力的增加，只有美國對這種上升和增加所可能帶來的世界霸權之變遷的恐懼，才能解釋上述的結論。

美國國際關係學界主張「捲入」的學者，基本上屬於自由主義一派，希望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中國變為具有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從而消除中國的可能威脅。另一派則強調實際利益的衝突，認為國家之間實際利益的衝突很難通過一國的制度演變來解決。

換句話說，只有霸權之爭，也就是國家利益之爭，才能解釋為甚麼美國需要認真看待中國，並提出所謂「圍堵中國」的新戰略。雖然，意識形態對美國知識界和一般民眾，可能有某種喚起民族主義情緒的直接刺激作用；但對美國的決策者來說，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卻是一個更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國際關係中和政治家那裏，意識形態也許不過是地緣政治競爭的一種工具而已。

不過，問題是：實力在不斷增長的中國，是否會威脅到美國的世界霸權？這顯然有待歷史的發展來判斷。但是，從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角度來說，一個國家顯然不能等到威脅已經實際出現的時候再來應對，而必須防患於未然。歷史地看，1949年以來，中國並沒有因為實行共產主義制度而增加她的對外擴張性。在冷戰時代，中國雖然有意要作第三世界的領袖，但卻從來沒有組織自己的盟國體系，亦沒有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由中國的國力所決定的。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更是強調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致力內部經濟建設，不去作國際上的領袖，不去干涉世界上更多的事情^②。同時，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正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歷史的吊詭在於：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恰恰是一個變革中的中國，被西方特別是美國，當成了一個巨大的潛在對手。產生這種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美國人看來，恰恰是在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後，她的擴張性可能會加強。一方面，改革開放直接增加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與改革開放相聯繫的中國的新發展戰略，要求中國採取外向型的態度。後一個方面尤其值得提出討論。

歷史地看，中國並沒有因為實行共產主義制度而增加她的對外擴張性。到鄧小平時代，更是強調致力內部經濟建設，不作國際的領袖。但在美國人看來，恰恰是在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後，她的擴張性可能會加強。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路線，經濟上是封閉的，因此不具備擴張的條件。現在，中國把民族的關注點放到經濟建設上，開始進行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路線的轉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人口，以如此有限的資源，要發展起來，一方面需要西方先進科技和管理；另一方面亦要開發資源，因為沒有資源為基礎，僅有技術和管理就不過是無米之炊。因此，在資源、市場、開放政策等壓力下，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外向的特點，所以中國不能不實行對外開放。比如，像台灣、南海這樣一些地方，主權的問題現在就直接具有現實經濟和政治的含義，對於中國在下一個世紀的發展越來越具有生命線的意義。所以，我們可以說，恰恰是在中國進入了制度轉型的軌道和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之後，她的對外擴張性才不得不提上議事日程，中國的威脅對美國來說才變得越來越現實了。美國和西方應該完全明白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因而也會以這樣的認知來判定中國的客觀發展趨向。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恰恰是中國的經濟變革和制度轉型，特別是市場化經濟變革所帶來的經濟後果，使得中國在西方世界中變得更具威脅性。如果喬治·凱南當年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圍堵蘇聯策略，是着眼於蘇聯共產主義制度對西方的威脅^⑩；那麼，今天美國戰略界所討論的「圍堵中國」，就主要是着眼於中國的制度轉型所帶來的中國實力的崛起，也許，更多的是在用與西方相同的市場經濟邏輯，來觀察和推測中國的未來。中國有中國的邏輯，不能不改革開放；西方有西方的邏輯，不能不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圍堵中國」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歷史的骨節眼上被提出來的，就是在這樣兩種邏輯交叉的狀態下產生的。

今天美國戰略界所討論的「圍堵中國」，主要是着眼於中國的制度轉型所帶來的中國實力的崛起，也許，更多的是在用與西方相同的市場經濟邏輯，來觀察和推測中國的未來。

對抗西方？狹隘民族主義的誤區

從中國與西方兩種邏輯交錯的背景來看，中國對美國和西方「圍堵」的反應可以有三個基本類型。

第一類，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其所帶來的可能結果，是在國際戰略中堅持與西方對抗；而在國內政治中，則不免反對所謂「和平演變」，排斥肇源於西方的現代化觀念和制度。這種思路要求中國放棄對外開放與制度變革，並通過加強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來與西方相抗衡。在實質上，它是要改變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在我看來，中國一旦放棄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走向反對「和平演變」老路，則中國對世界的所謂「威脅」就成為一種純粹意識形態的神話。原因很簡單：從整體上來說，如果不進一步實行改革開放，則無論是從經濟實力、經濟發展的勢頭、科技水平、軍事能力、政權的合法性、政治體制的決策能力和決策效益等方面來衡量，中國都明顯地處於劣勢，並不構成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它至多只會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中的一個政治

異端和一種意識形態噪音。採用這樣的方式來應對美國的圍堵中國政策，將從根本上把問題取消，即取消中國的實力增長和外向發展，從而取消中國的競爭力和戰鬥力。這樣的中國，將是一個憤怒而弱小的中國，是一個戰鬥意願高於戰鬥能力的中國，是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足可自慰而大幅度犧牲民族的整體和實際利益的中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這種看起來十分有民族尊嚴、實際上卻犧牲民族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文化體系叫作「狹隘民族主義」。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可以叫做「激情民族主義」^①。清末「義和團」是這類民族主義的典型。今天，這種狹隘民族主義在中國還有影響力和號召力。在中國有了一定的綜合國力、有了經濟上的長足發展之後，一種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情緒似乎尤其有足夠土壤而發展蔓延；在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現行政治體制下，更難以避免種種充滿狹隘民族主義情結的政策思路會主導國家決策的悲劇。「中國威脅」也許最終被證明不過是一個虛構的神話，而這種證明並不是由於中國人對於國際社會的善意，亦不是出自「中國永遠不稱霸」的宣告，而是來自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由於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用，中國將失去繁榮富強的機會；而一個貧弱的中國，則無論其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與西方如何不同，都不會對美國和西方構成真正的威脅。

另外一類反應，從概念層次看，可以是完全拋棄民族主義。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可以是順從美國和西方的意志，按照美國和西方的標準，在中國的國家利益上作出讓步。直至泯滅中國的民族特性，解構中國的國家主權^②。這同樣是犧牲中國的邏輯，只是表現不同而已。就國家利益而言，這種思路和文化可能比較難以在中國成為氣候。但問題在於，這樣的對外政策思路，常常與所謂「民主運動」或異議運動聯繫在一起，因此不僅增加了這一思路的迷惑性，也減弱了民主化變革的要求在中國土壤上的感召力。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好，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也好，都應該是源自中國自身發展的邏輯，而不是西方的邏輯在中國的延伸。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邏輯來制定中國國策，不論是在中國現實的條件下，抑或是在國際社會依然以民族國家為結構主體的基本背景下，結果都可能是：中國將在另一種意義上滿足於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但是同時犧牲了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這樣的中國，可能沒有憤怒，而是溫良謙讓，但卻是弱小的；她可能失去與西方對抗的意願，因此不會引起羞辱，但是同樣會在順從中受到羞辱。

建設「理性民族主義」，鑄造新型國際戰略

除了以上兩種類型外，我們還可以有第三種選擇：繼續中國的邏輯，正視西方的邏輯；不必有戰鬥的意願，但是有戰鬥的能力；並不尋求對抗，但是有實力進行對抗；學習西方的東西，但並不因此成為西方的附庸。一句話，我們

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中國放棄對外開放與制度變革，並通過加強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來與西方相抗衡。在我看來，這樣的中國是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足可自慰而大幅度犧牲民族的整體和實際利益的中國。

要堅持民族主義，但是這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民族主義，是開放的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以建設與變革本民族為核心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以排斥和凌辱他民族為目的的民族主義。

應該說，民族主義在歷史中常常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往往帶有強烈的情緒性。中國近代史上尤其長期充斥着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內是不同族群之間的敵視和仇恨，對外則有一種強烈的排外思想。自明末以來，由於中國的衰朽、滿清的入主和西方的入侵，中華民族在強烈反彈的情緒中促成了狹隘民族主義思潮的活躍。由於社會環境的、政治體制的其他各種原因，一種心胸開闊的、能夠溶入國際社會而又不失自己民族個性的民族主義長期無法形成^⑩。現在，如前所述，在國際環境惡化的時候，狹隘民族主義又有抬頭的危險。怎樣使民族主義理性化，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在相對務虛層次上，中國應該發展一種新的民族主義主文化，從而充實民族個性、強化民族認同(identity)，在空想的國際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之間逐漸找到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形態。

就更為深刻的層次而言，民族主義應該在「制度」(institution)層面上表現出來。政治學者經常會強調institution，這個概念譯作中文的「制度」並不是十分確切，姑且勉強沿用。這裏我要說的是兩層意思：第一，民族國家應該是在制度層面體現民族主義，否則難有精神凝聚，如果沒有制度層面上的體現、保障和制約，民族主義常常會走火入魔。第二，應該以本民族的、自己國家的制度建設來達到自強，才是開放、理性的民族主義的精魂。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中國還遠遠沒有完成自己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過程，在內部制度建設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長的道路要走。能不能走好這段路，既是中國能否興旺發達的根本，也是中國能否與國際社會和睦相處的要害。

這就要求建設一種「理性民族主義」。所謂「理性民族主義」，就是承認民族特性的存在與民族利益的衝突，不以某種抽象價值否定民族特性與民族利益；反過來，也不以民族特性否定某種價值，而是主要以民族利益的實現為標尺來決定價值與特性的取捨，直至變革本民族以實現民族利益。近代民族國家，常常是民族主義理性化過程中的一種承載體^⑪。但是，民族國家也有一個不斷理性化的發展過程。相對說來，集權政體的理性化程度較低，民族利益往往因集權政治的需要而被犧牲。而「理性民族主義」則要求以一具有合法性的機制來定義民族利益，繼而以民族利益為民族國家的行動準則。

在這樣的思路下，中國人只能從中國自己的邏輯出發來看待世界。無論誰人懷着甚麼樣的主觀目的，只要他做的事在客觀上能夠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對於中國的民族利益來說都並不是一件壞事。中國不應該由於非西方和西方的對抗而放棄吸收西方的價值和制度，亦不應該放棄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有益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由於西方要對中國採取「捲入」和「圍堵」的戰略而實行閉關自守。中國還是要開放門戶與變革體制。中國要實行改革和開放，西方要實行捲入與圍堵，各有各的邏輯：西方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制度變革與對外開放就不對中國實行圍堵，中國也就不能因為

「理性民族主義」要求一具有合法性的機制來定義民族利益，繼而以民族利益為民族國家的行動準則。中國人只能從中國自己的邏輯出發來看待世界。西方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制度變革與對外開放就不對中國實行圍堵，中國也就不能因為西方的圍堵而放棄改革開放。中國應該更進一步推行變革，從而打破圍堵，走向世界。

西方的圍堵而放棄改革開放。既然西方因為中國變革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力增長而採取「圍堵」戰略，那麼中國就應該進一步推行變革以保證國家不斷繁榮昌盛，從而打破圍堵，走向世界。

這樣的所謂理性民族主義應該落實到具體的國際戰略上來。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愈發千絲萬縷的今天，有沒有一個正確有效的國際戰略來保證中國的民族利益，正在成為中國國家建設中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圍堵中國」逐漸成形的情况下，在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內，中國在國際上會面臨巨大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輿論的壓力。這些壓力必定會在國內產生相應的後果。中國要應對這樣的危機，一方面必須在國內進一步加強經濟的變革，更好的做法是相應地進行比較穩妥的政治改革；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調整並重新形成中國的國際戰略。我認為，自9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國際環境進入了一個從70年代初期以來最差的時期。在70年代初中美戰略接近之後，中國的國際環境得到了基本的改善。而90年代初以來，由於冷戰的結束和中國的崛起，也由於中國內部的一些政治事件，比如1989年的北京事件，使得中國的國際環境急劇惡化。自此之後，儘管中國政府實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重新推行經濟市場化改革，也包括外交上的努力和成功，但是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環境不斷惡化的趨勢。面對一個比較惡質的國際環境，中國要想集中精力進行國內的經濟建設、保持對外開放，就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和恰當的戰略。一個正確的、有效的對外戰略，不僅能夠保障中國自立自強，而且也能夠幫助她利用世界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來自我建設，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保持一個有尊嚴的地位。現在，狹隘民族主義抬頭，民族虛無主義也頗有影響。按照前者的路線，中國如果和西方實行強硬的對抗，國內政局就會變得更加集權與脆弱，經濟也不能走向世界化和市場化，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就要衰退，中國社會因此將面臨巨大的危機。按照後者的路線，中國將不可能有積極進取而又強有力的對外戰略，亦因而不能分享世界資源，中國的經濟增長從長期來講也可能進入停滯狀態，也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中國要採取甚麼樣的策略才能達致既不對抗，又不封閉；既能學習西方而自強，又能不被西方牽着鼻子走？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挑戰：它在挑戰中國的決策制度和政治體系，也在挑戰中國人的智慧和能力。

因此，在世界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能不能形成新的正確應對世界環境的全球戰略，是對未來中國命運的一個很大的考驗；而中國下一代領導者的歷史使命和歷史機遇，可能就在於形成這樣的全球戰略。接受這一挑戰，調動智慧資源，推動制度變革，改善決策機制和提高決策能力，以形成新的國際戰略來面對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社會，中華民族才可能有一個比較好的未來。我們也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類比：在70年代末，中國推動了改革開放，以面向農村和土地的制度變革為突破口，比較正確地應對了當時發生和面臨的種種危機，使中國享有80年代以來的繁榮和穩定；在90年代末，我們需要推動民族國家的理性建設，以面向世界和海洋的戰略鑄造為突破口，來正確地應對今天

在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內，中國在國際上會面臨巨大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輿論的壓力，要應對這樣的危機，一方面必須在國內進一步加強經濟的變革，更好的做法是相應地進行比較穩妥的政治改革；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調整並重新形成中國的國際戰略。

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內部轉型和外部「圍堵」的種種危機，為中國人在新世紀的國際地位開創道路。惟此，加強內部的制度性建設，創造適合自己的制度，落實自己的民族特點，把宗教式的、單純排外的民族主義熱情變成一種理性、強調制度變革的民族主義思考，就成了中國的民族命運所繫。

註釋

- ① 可參閱1995年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等。例如羅勝紹(Lorthensal)在《紐約時報》的專欄。
-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 ③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④ 現實主義的觀點，可參閱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and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⑤ 自由主義理論可參閱: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9), second edition.
- ⑥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s. 3 & 4 (1983);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⑦ 可參閱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⑧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Vintage, 1973).
- ⑨ 關於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參閱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 ⑩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⑪ 民族主義是一種複雜的政治和文化現象。比較系統的論述，參見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2), revised edition; Ernest Gell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
- ⑫ 見最近王若望等在西藏、台灣等問題上的言論。
- ⑬ 金觀濤:〈創造與破壞的動力: 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其演變〉, 載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頁127-41。
- ⑭ 參見上引文之相關論述。